

前工业文明 与中国文学

陈冠和 王晓明 主编

栾梅健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QIANGONGYE
WENMING
YU ZHONGGUO
WENXUE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栾梅健著. —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5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ISBN 7-5135-2997-1

I. 前... II. 栾... III. 工业经济-影响-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682 号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

栾梅健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电话: 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8.375 印张 198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135-2997-1/I·249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辑说明

又一轮世纪交替之际,当代中国学术界对 20 世纪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的研究,日益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 20 年来,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里,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不仅在国内的学术领域是比较活跃、成果也比较显著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国际汉学领域内也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所以,研究和总结 20 世纪文学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梳理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在今天的特殊环境下,具有继往开来、启示新世纪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

“现代”,是一个区别于“古代”的学术概念,也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以后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所呈现的一个整体性的标记。就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看,其由胚胎期向成熟期的转型标志,正是以提倡现代汉语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相关的文学革命。将以现代汉语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即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学”,它包括了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庞大体系。自然,20 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也在其列。所以当“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传统概念转化为“20 世纪中国文学”以后,为了更好地沟通 20 世纪与 21 世纪文学之间的连续性,我们有必要重新确认和界定“现代文学”的定义,“中国现代文学”不再是过去界定的“1917—1949 年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而是超越了具体年限,并以现代汉语的确立为开端的跨世纪

文学。本丛书将“现代”冠于“中国文学研究”之前,就是表明了我们现代学学科建设的一点看法。

在世纪末钟声撞响前夕,世界上处处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处处有宏大的理想巨构。但我们策划本丛书的宗旨则很平凡,也很渺小,我们只是因为热爱文学,热爱从事了十几年的研究专业,所以诚心诚意地想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做一点实在的事情。本丛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为国内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自由而切实的思想学术园地。我们称之为“书系”,是打算推出一套研究系列,它包括:甲种,新著新论,推荐出版用中文写作的专题研究著作和论集;乙种,域外新译,精选海外汉学家所著的优秀的专题研究论著,约请合适人员译成中文出版;丙种,史料新知,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发现和整理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理想能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理解和支持,共同努力,使这一学术园地得以不断发展。

陈思和 王晓明

1999年11月于上海

序

范 伯 群

当栾梅健先生确定《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作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好选题。当他将提纲打印给我时,我觉得他是完全有把握驾驭这一具有新意的课题的。从宏观上去考察社会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的关系,从新的视角去探讨社会经济对文学及文化的潜在影响,在过去的论著中有人提及过,但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论证。特别是对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过渡到现代型的进程中,工业文明这一重大的因素,作为“不出场的人物”,在“幕后”究竟起了多大潜能的作用?这的确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而栾梅健先生根据中国在这一“时段”的具体的国情,为“工业文明”举行了“加冕典礼”,冠以一个“前”字,则又体现了他的思辨的精确性和论证的科学性。他的论著从文学总体格局、观念情感更迭、创作方法特征等三个方面高屋建瓴地纵览前工业文明在中国文学领域中所镌铭的深刻印记。在论述过程中,新意迭出,如关于小说内容与形式的现代化进程,过去总是在文学观念或美学意识的更新上去做文章,而栾梅健先生却突出地注意到了小说所构成的物质材料——如造纸工业的现代化、印刷条件的机械化与小说形质的演进关系。他将文学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与知识背景上,从而更能说明某些特定的文学史现象;又如,他能以世界水准去测衡,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文学并非是当时众多知识精英所要选择的主要职业。

这个观点与以往文学研究所说的大批知识分子弃理工而就文学的看法相对立,然而又有相当的启发性和说服力。

由贾植芳等教授组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致确认: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而大陆的两个有学术权威性的刊物——《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都各自选载了这篇论文的章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这篇论文颇具学术创见的有力佐证。

栾梅健先生从攻读硕士学位起,到从事大学教学和攻读博士学位,一直都有优异的表现。他在台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和《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等学术专著,都有很高的评价;而他为《中央日报》策划的大陆《印象大师》专栏,为《国文天地》策划的《大陆焦点学人》和《现代文学名家的第二代》专栏,皆有良好的反响。凡此都显示了他的学术开拓和组织创意的能力,说明他是一位年轻有为、有充盈灵气和潜力的学者。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又要以专著的形式与学术界和广大读者见面,相信也会与他过去撰写的专著及策划的专栏一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1998年6月于苏州大学

引言 在特定时代中孕育

在本书中,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在进入正题研究之前,有一些概念、范畴应当首先加以廓清与界定;对于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也想及早加以简介,以便读者迅速熟悉我们的课题,并有兴趣参与进来。

例如,什么是前工业文明?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这一研究课题形成的理论根据是什么?研究的要点与难点是什么?如何运用合适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最后,又将期望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等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决定了我们特有的语汇、语境,而且还深层地映现出我们的研究层面与追求目标。下面,试概要论述之。

—

首先,想界定前工业文明这一概念。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马克思曾经做过科学而深刻的概括: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

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①

如果以具体的社会形态来对应马克思的这三个阶段,则第一阶段包括了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对自然、神灵、部落、国家、宗族等方面的依存与附从关系,形成了人类社会早期丧失了人的个性和主体阶段的“人的依赖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打破了从前奉若神明的权威与偶像,在广泛的物质交换的基础上,形成了全面而丰富的社会关系。有了物质也就有了个性发展的自由,而这自由是依附于物质的。这是第二阶段。真正摆脱了“人的”与“物的”依赖关系的理想社会的产生,则是人们向往的生命个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共产主义阶段。这一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

再从生产方式来考察——这一考察方式,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划分社会形态的最根本依据。在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农业文明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原始社会中的狩猎与捕捞,其实正是农业文明的初级形式)。在农业文明中,无须更多的社会交往,人们被束缚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价值观念与思维习惯。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它的出现得自于工业文明,以蒸汽机发明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从本质上改变了农业文明时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推入到了近代的范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进步。它第一次真正使人具有了从土地上脱离开来的可能。其意义决非如唐、宋那样的朝代更迭所可比拟。

试看一段美国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对工业社会的清晰勾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04页,人民出版社,1975。

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商品,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时间是有年月顺序的、机械式的,由钟表的刻度均匀地隔开。能源利用取代了人的体力,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以此为基础的标准产品大批量生产便成为工业社会的标记。能源与机器的使用改变了工作的性质。技艺被分解成简单的操作步骤。……这是一个协作的世界,人、材料、市场,为了生产和分配商品而紧密结合在一起。^①

贝尔并进一步概括道:“工业革命归根结蒂是一种用技术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努力,是一种用功能和理性的技术概念置换资源和气候的任意生态分布的努力。”^②在比贝尔更早,也更著名的马克斯·韦伯那里,这种种“努力”有了更具体的表述。在韦伯看来,工业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③

在贝尔、韦伯等人的论述中,都出现了“理性”这一概念。按照通常的理解,资本主义总是与金钱万能、惟利是图结合在一起的。“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似乎成了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冒险家的共同污点。然而,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8页,三联书店,1989。

② 同①,199页。

③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6页,三联书店,1987。

上。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古代罗马贵族、中国封建官僚乃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地小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现代的任何人。区别只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生产与交换方式。这也是对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各自社会进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最好诠释。因而,马克斯·韦伯认为,所谓工业社会应该是指:其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尽管有些简略,但毕竟大体上说中了要害。至此,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已不难了解。

那么,工业文明为何又要有前、后之分呢?

首先,这当然是基于这一社会阶段中出现的明显差异性。在历经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其不同的运行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前文所引贝尔对工业社会勾勒的那段文字,那种对机器与能源的赞美,其实是工业文明初始阶段的情景。到了19世纪末,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在运行特征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成了社会生活中新的内容。“后工业化阶段,人们工作的种类将有所改变,即从生产到服务(尤其是人力和专业化服务),同时,理论知识的集约也将在经济调整和决策方面增加比重。”^① 在人的心灵方面,社会物化现象日益严重,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物的依赖性”越来越暴露出它对人类生命个体的异化作用。几乎不约而同地,“前工业”“后工业”“前现代”“后现代”……这些标明社会进程的名词出现在众多媒体和人们的口中。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其次,这也是我国特定的国情使然。尽管早在明朝末年,我国苏州、杭州等主要城市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正式进入我国,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① 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60页。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而一同产生的。这是一种在外力干涉下的不自觉行为。其后,我国社会的进程更是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中国人民已经有了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在齐心协力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后逐渐开始的我国工业化进程,直至我国现代化实现之日,才是工业文明在我国正式确定之时。换言之,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一系列现代化建设,都是在工业文明迈进途中所进行的具体步骤。因此,将鸦片战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进程称为“前工业文明”,是有其现实依据的。

第三,使用“前工业文明”这一概念,也还有思辨与表述层次上的考虑。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现在正处于“后工业”或“后现代”的阶段,如果我们将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称为工业文明,那么必将在理论上出现歧义。而使用“前工业文明”这一概念,便可以表明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区别,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只是处于初始的与发展的阶段——到21世纪中叶,中国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正可说明现今中国社会工业化程度的初始性特征。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的我国工业化进程,是在列宁所认为的亚洲最落后的农业国度中进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消长起伏、犬牙交错,使得人们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文明方式来加以概括。尤其是我国广大的内地农村,以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业人口在这一阶段长期存在的事实,使我们不能径直运用“工业文明”这一概念。因此,我们选用“前工业文明”这种提法,以表明生产方式之间的纠葛、混杂与共存,就不仅符合实际,而且在理论表述上也比较准确。

在本书中,考虑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是一种渐进的、范围窄小的运动,并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作家进入解放区和国

统区,在社会进程发生错位的同时,他们的生活范围与描写对象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本书所论述的范围与许多例证的选用,大都取自“五四”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尽管并不是全部,然而却是具有典型性的。

二

在论述了前工业文明这一概念之后,我们接着想探讨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要研究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在理论上是否能成立?在实践中是否能行得通?

在我国数千年漫长的文学历程中,先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其实都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即使在某一朝代的不同阶段,如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也都有着各自较为鲜明的印记与个性特征。但是,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些变化其实都还只能算是量的变化,并不能形成一个迥然不同的质的分界线。如一道道环扣,它们串起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链,只是到近代以后,文学发展的历程才如脱缰野马,偏离了原有的运行轨道,由此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这是中外文学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区别只是在于,我国文学的近代化历程比西方晚了一二百年而已。

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显然的:这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结果。

还是来看一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不无赞美的描写: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 100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起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

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一切都变了！机器、化学、轮船、铁路、电报……这些工业化的利器，如魔术般改变着整个社会。不仅是物质品种、交换方式、生产手段，而且在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诸领域，都同时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许多国家中的事情。

在中国，尽管起步较晚，而且这种起步还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不自觉地出现的，但是，变化却也明晰可辨。

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被强行开放，中国原有的农村自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众多的群众被卷入到商品交流之中。“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几个大城市和重要通商口岸，广大内地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到了1919年，除边远地区外，各省都建立了一批近代厂矿。”^①在“五四”前夕，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通商口岸，迅速形成了几十万，甚至二三百万人口的不同于传统农村集镇的工商都市。在农村，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们，再也看不懂这个日趋怪异的世界。纱厂、小火轮这些从未听说过的玩意

① 见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10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儿,似乎在梦境中一夜之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命运。即使在遥远的内地四川,那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不是由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的工业文明之一——铁路所引起的吗?这一切变动,是以往任何封建朝代所没有过的。难怪老通宝们在纳闷、不解之余,似乎若有所悟地说道:“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当然,这还只是外在方面的一些表现。更深层的,还是观念与思维习惯方面的变化。

很显然,工业文明在改变着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内心世界。“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这是马克思在研究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后得出的结论。尽管不能将这一结论与某一时期的特殊经济状况简单地对应起来,然而,当某一种经济状况在较长时间中成为社会的重要经济力量时,这一结论便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中国,自鸦片战争起逐渐出现的工业化进程,确是一股不断壮大与成长的经济力量,它由此而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上层建筑领域所产生的作用,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位抱着《太上感应篇》躲往大上海的《子夜》中的吴老太爷,眼中所见的十里洋场竟是那样的与他格格不入。荒淫无度、伤风败俗、人欲横流……他不理解这个世界,也极力诋毁这个世界。他的观念已与现今的世界相距甚远。至于未庄那位一无所有的农民阿Q,偶然去了趟城,也觉察到这个世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真是“他妈妈的”了!

观念真的变了,一切都变了。这正是我们探讨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基础。惟其变,才会有新的特征;惟其有新的特征,才需要加以研究。

正是在这里,我们对研究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这一课题有了充分的自信。这是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研究领域,它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这也是一项以往未曾有人系统研究过的内容,它需

要我们去开掘,去创新。有基础,可以使我们的研究不致成为空中楼阁,成为向壁虚造的幻影;有创新,则可以使我们的思维经受挑战,体会探索者的乐趣。

对此,我们在确信研究课题可以成立的同时,心中确也满蕴着几分热情。

三

那么,如何来展开我们的研究呢?应该从什么样的层面与角度来构建我们的研究体系与研究框架呢?

这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然而却必须在正式研究之前做出明确的抉择。

作为一个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它的要点是要能较为明确、清晰地指出前工业文明时期中国文学的特点。这个特点既要是内容上的,也要是形式上的。惟其如此,我们的研究才不致泛泛而谈、空空洞洞,才不致给读者留下只有新名词而没有新内容的印象。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既不同于文学史的写法,也不同于具体的作家论。与思潮、流派的研究方式,也有明显的不同。它不仅要能勾勒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主要状貌,更重要的是要能发掘与揭示出这一时期文学方面所出现的新特质、新要素——这种新的特质与要素是要真正属于前工业文明方面的。因而,处理好虚与实、具象与抽象、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便成为我们研究中的第一个难点。既不能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也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之。

第二个难点是要能界定和处理好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自鸦片战争以后,各种政治势力、文化潮流、思想观念都不同程度地渗透与影响到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构成了这100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奇特景观。有时是政治方面的,有时是外来文化方面的,也有时是传统习俗方面的,都或多或少甚至在某些时期是决定性地

制约与限定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因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文学进程,当我们从工业文明这一角度来观照与甄别文学运行的进程与特点时,就必须格外小心。即使是从“五四”到抗战爆发这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其文学的变化也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既不能对其他因素视而不见,同时也不能让我们的注意点淹没在眼花缭乱的现象之中,而应该时时记住“前工业文明”这一主要的着眼点。在此,我们必须有几分清醒与冷静。

在明确了研究对象的要点与难点之后,其研究方法 with 手段也就不难选取与确定了。

尽管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现今一些新潮研究者的眼中,已经是那样的落伍,但我们思之再三,最后还是决定采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这似乎有甘居落伍之嫌,但我们认为,前工业文明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它与文学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只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才有可能切中要害、有的放矢。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符号学、叙述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诸如此类的新方法,可能都无法成为本课题研究的统领性与全局性的有效手段——尽管在对某些具体文学现象与作家的分析中,仍然可能吸取其有用的成分和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们最为关注的,除了社会学方法之外,可能还会把比较研究的方法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来。

从共时角度看,西方自十六七世纪开始的文学近代化进程,无疑将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参照。工业文明源于西方,它对文学的影响最初是在西方文学中表现出强大的震撼力与推动力。我国自鸦片战争后逐渐开始的文学变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着西方文学已经走过的老路。一些理论上的迷雾,以及我们以往未曾注意的思维中的盲点,可能都会在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并补充与丰富我们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一些重要

的文学现象,尽管从我国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找出许多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我们却往往可能忽视了其中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原因,并进而在夸大民族个性的同时,低估我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从历时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庞大、最古老的农业大国,它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与悠久传统,使得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因而,它的传承力量与惰性,也比任何国家都要来得强烈与持久。更何况,中国社会进入工业化的进程,并不是自己潜移默化的结果。这种断裂现象,更使得传统文化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有着极为复杂与特殊的表现,稍一疏忽,便极有可能使自己迷失在杂乱无序的现象之中。这确是中国文学近代化进程与西方颇为不同的地方。因此,只有真正放眼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仔细比较近代以来的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差异,才有可能发现近代以来我国文学新的特质,并进一步确认这种特质所具有的近代意义,从而使我们的论题能够为划清两个重大文学时代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们想谈谈全书的体系设想与框架安排。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已不难得知,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想揭示我国漫长的古典文学在面临工业文明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本身,从中外文学历史的角度看,都是革命性的。因此,重新审视与确立前工业文明时期我国文学的地位,以及它在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成为我们当务之急的讨论内容。至于这其中的变化,既有文本方面的,也有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以及作为消费与接受主体的读者。只有首先找准文学、作家、读者在这个社会进程中各自所拥有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我们才有可能进而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是需要论述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格局编”。